

现代史研究资料

第一期



江西现代史研究会筹备小组

一九七九年八月翻印

目 录

周恩来同志在旅法期间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些情况	(1)
瞿秋白同志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的序言	(2)
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	(4)
罗章龙教授谈五四运动	(6)
天津“觉悟社”社员代号及化名	(9)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会举办陈独秀等历史人物评价的讨论会	(10)
列宁论普列汉诺夫	(12)
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	(15)
张维桢同志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8)
关于朱德同志早期经历的几件史实的订正	(20)
毛主席创办文化书社	易礼容 (22)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一)	包惠僧 (24)
关于中共中央 (杭州) 西湖会议	(26)
关于彭湃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和入党的时间问题	(29)
关于李少石之死	(31)
美军观察组简介	(33)
李立三同志谈安源工运	(34)
罗章龙教授谈“二七”大罢工	(36)
关于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城和召开遵义会议的时间	(44)
新安旅行团简介	(47)
毛泽东等同志填写《少年中国学会调查表》的背景	(49)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二)	(50)
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机构和其中的共产党员	(53)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斗争	(58)
“八一”建军节的由来	(60)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	(61)
回忆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唐 铎 (68)
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	廖焕星 (78)
关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及中共旅欧支部的情况	徐特立 (82)
肖克同志谈八月失败的经过	(83)
“八月失败”	杜修经 (85)
湘赣工作座谈会任弼时的总结 (摘录)	(88)
横眉冷对 英勇无畏	
——回忆周副主席同张国涛的斗争	张 海 (93)
AB团和“富田事件”是怎样一回事?	(95)

周恩来同志在旅法期间 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些情况

一九七四年三月香港波文书局出版的严静文著《周恩来评传》上刊登了周恩来同志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八日以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身份致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彭素民信的影印件，这封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法国帮助国民党改组，筹建国民党旅欧支部的一些情况。此外，台湾伪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于一九七四年六月出版的王章陵著《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中也转引了一些中共旅欧支部帮助筹建国民党旅欧支部以及周恩来同志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资料。这两本书，观点反动，但所引载的原始资料大致可靠，现据该二书所引资料及其他资料将周恩来同志在旅法期间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些情况简介如下：

一九二二年八月，国民党总部派王京岐去法国筹组国民党总支部。当时，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委托协助王京岐工作。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曾多次与王京岐取得联系。一九二三年三月，国民党代表参加了巴黎举行的共青团旅欧支部常会，研究共青团旅欧支部成员加入国民党问题。四月，共青团旅欧支部派代表至里昂和国民党代表进一步商谈。一九二三年四月，王京岐给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长孙竞等的信中有如下记载：

“兹有请示者：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八十多名，月来探其组织颇完善，而其行动亦与吾党相差不远，因斯之故，曾与多次接头，前月十号特派代表赴巴黎参与他们的常年大会，他们大部分意见欲加盟本党，或与本党携手合作。前天接他们来信，特派二个代表来里昂会商一切，其结果如何，来日再报。”②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同志和尹宽、林蔚代表共青团旅欧支部至里昂与国民党代表王京岐商谈并达成协议。王京岐第二天向国民党中央总务部的报告中说：“昨天开会结果很好，旅欧少年团八十余人极端赞成本党宗旨，一概加盟本党”。③

一九二三年八月，王京岐回国，他在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党务部报告工作的信中说：“周等三人（指周恩来、尹宽，林蔚——引者注）先加盟本党，以表诚意，并请委巴黎周恩来尹宽为国民党分部筹备员”。④

在王京岐回国前，周恩来同志曾写信给他，对于旅欧国共两党合作的原则提出建议：“我们先说在欧的事，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只是我们能和国民党人合作的，在现时在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有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的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我们可随着时势变迁而计划我们当前所要做的工作，目下的事，如在欧党势力的扩充，党员的训练，刊物的印行，革命工作的策划，均宜着手进行。前二事我们感于国民党务之不振，在欧求学时代，实宜于

此点多多努力。后二事你此番归国宜和党中干部及总理孙先生多多商榷，最要的，如何使此在欧的党员有所事事，其尤要的便是刊物经费的筹措。”⑤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旅欧支部在里昂举行成立大会，周恩来同志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批评了国民党腐败现象。⑥周恩来同志当选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的总务主任，李富春同志为宣传主任。在王京岐归国期间，周恩来同志即负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实际责任。

周恩来同志受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之后，即着手进行巴黎区分部（即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的筹组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三十一人。周恩来同志以通讯处筹备员身份报告了筹备经过，通讯处临时主任李富春同志报告了巴黎党务的发展情况。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通讯处规约，选举了通讯处职员，聂荣臻同志被选为通讯处处长。会议次日，周恩来同志写信给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彭素民，报告通讯处筹组和成立情况。信中说：“通讯处大会情形致如上述，正式职员且已举出，此后当由干事会负责向支部报告其进行状况，再由支部转达总部。至此，恩来所受我总理中山先生及总部的组织巴黎通讯处的使命已告结束……。”⑦

一九二四年七月，周恩来同志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中国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的第二次代表大会⑧

【注】

①饶竟群回忆1976年12月25日

王章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

②王京岐致孙竞、郑达佛函 1923年4月25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

③王京岐给国民党中央总务部报告 1923年6月17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

④王京岐向孙中山、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党务部报告书 1923年8月（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

⑤周恩来致王京岐函（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

⑥《旅欧中国国民党支部第一次大会报告书》（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

⑦周恩来致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彭素民信 1924年1月18日（见严静文《周恩来评传》）

⑧“中国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摄影”（见严静文《周恩来评传》）

瞿秋白同志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写的序言

编者按：我馆藏有一九二七年四月武汉长江书局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此报告曾全文登载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出版的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战士》第三十五、三十六期合刊以及三十八、三十九期上。同年三月十二日的中共中央机关刊

《响导》第一九一期登载了报告的前半部分，以后没有继续刊登。据杨之华同志回忆，这是由于当时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彭述之的压制。当时同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同志对毛泽东同志这个考察报告非常重视，主张在《响导》上继续登完，但为彭述之所拒绝。于是瞿秋白同志即将此文交我党在武汉办的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革命》的书名出版，并且写了序言，热情赞扬了这篇报告。现将该序言刊登于下。

《湖南农民革命》序

“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讼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有“人”说他们是过分了，但是这是不是人话呢？——至少都是反革命派的话，中国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谁是寇呢？都是失业贫困而暴动的农民。谁是王呢？都是利用暴动农民而得胜的“土匪头儿”。中国的真正老牌国货，便是土匪和官僚。土匪是革命党，官僚便是地主土豪的代表。当然，这些官僚士大夫原本是土匪头儿的奴才。土匪头儿没有得志的时候，总是和失业破产的平民称兄道弟，等到他得志了，他便雇用收买许多士大夫官僚来压迫平民，他便成了地主阶级的代表。如今的世界可大不相同了。西洋外国的世界革命起来了，是把俄国的“土豪头儿”，“巨腹贾”的代表——所谓“察尔”（Tsar）也者，和大资本家，一箍脑儿推翻了。这是谁做成功的事？是工人，所谓无产阶级率领的革命呵，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就起来，他在城市中的斗争足以率领三万万九千万的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从今以后渐渐的要脱离土匪头儿的利用，他们现在有了新的领袖——工人，这个新的领袖的利益是和他们相同的，是能率领他们革命到底的，不象土匪头儿似的，事成了自己便去做皇帝。请看湖南的农民已经事实上能将力争自己的政权。他们打倒军阀、省长、知县大老爷、都团团总、土豪劣绅的政治机关。他们打倒玉皇大帝、元始天尊、天下都城隍、城隍老爷、土地公、五圣神、大狐仙的神权。他们打倒宗祠、族长、宗长、房长们、叔、舅、爷的族权。他们打倒父夫舅姑的男权。他们自己的力量解脱自己的桎梏，要将压迫者剥削者，个个正典型。这些龌龊万分的东西，都要他们自己起来，才能扫除。难道这些做过分么？当然，湖南农民的解放是得着国民革命军的帮助。但是战场拚命的国民革命军的兵士是谁？也都是贫困的农民呵！

农民打倒官权，神权，族权，男权是为着甚么？是为着创造自己的民权。他们农民协会的民众参加县政，主持乡民会议的运动；民众而且已经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甚么打官司交钱粮减租阻谷办学堂兴水利……都要自己来管。他们自己来管便怎样？要的是自己经营自己的生活。农民的生活便是土地。农民没有土地，便是如鱼失水。农民要一个国权，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家，当然愿意纳税。但是，第一，他们必须自己来创造这个国家；第二，他们的国家不许有土豪劣绅私有田地。他们只知道自己耕田所得，分出一部分给自己的国家，其他一概不能管。他们耕田纳税之外，难道还能承认地主劣绅的“不平等条约”。“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中国境内，不要有一个农民纳甚么地主的租；农民只能租国家的田，不能承认“不自耕作坐收田租”的人。这就叫做土地国有。农民自己耕三亩田，享用三亩，耕五亩享用五亩，——这些田地是只属于国家所有，但是耕种的人自耕自享，不能承认地主——这就

叫做转地农有！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澎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瞿秋白

一九二七·四·十一夜二时

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

在一些出版物中，一般都说中共“一大”的代表为十二人，按地区分，计为：

长沙：毛泽东 何叔衡

武汉：董必武 陈潭秋

上海：李 达 李汉俊

济南：王尽美 邓恩铭

北京：刘仁静 张国焘

广州：陈公博

东京：周佛海

但当事人回忆有不同说法。有回忆十二人的，也有回忆十三人的。回忆材料的分歧点，主要在包惠僧身上。现将各种不同说法分述如下，供参考。

一、毛泽东、董必武同志的回忆，前后说法不同。

根据毛泽东同志口述，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在上海这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议中，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参加会议的别人是：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我们总共是十二个。”

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九年四月在中共“九大”讲话中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坐的还有两个。一个是董老……另一个就是我。好几个牺牲了，如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上海的李汉俊；湖北的陈潭秋；湖南的何叔衡，这些都牺牲了。后来当了叛徒、汉奸、反革命的有周佛海、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后两个人还活着……还有另一个是李达……。”

根据董必武同志口述，韦尔斯·斯诺在《老赤卫队员的传记》中写道：“我参加了一九二

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每一个代表省派两名代表，日本留学生派了一名代表——周佛海。此人以后叛变加入国民党。湖北派陈潭秋和我为代表。湖南派何叔衡（后来在红军工作时，大概与瞿秋白同时在一九三五年被杀害）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做为代表，刘现在是托派。上海派李汉俊做代表，一九二七年在汉口被杀害；还有李达，现在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在武大任教。广东派陈公博做代表，此人叛变，担任南京实业部长，还有包惠僧，也在国民党内政部任官员。山东派邓恩铭同王尽美，这两个人后来都被杀害。共产国际派两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一是荷兰人，我们中国话称他为马林；另外一个俄国人，我忘记了他的名字。”

董必武同志一九五六年“八大”前夕回答《新观察》主编欧阳柏访问时说：“关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报上已经发表的很多。不过关于代表名额，过去发表的都是十二个，在我记忆里，却好象是十三个。当时代表的产生，是按地区决定的，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东京七个地区，各派两名参加，但东京的代表有一个没有回国，只有一个参加了，所以一共是十三个人。”

董必武同志一九七一年八月四日在《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中说：“‘一大’的代表，上海、济南、湖北、湖南、北京各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讲是十二人，有的讲是十三人。”

二、李达和刘仁静回忆代表为十二名，包惠僧参加了会议，但不是代表。

李达同志一九五五年八月二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说：“六月下旬到达上海开会的各地代表共十二人。”（名单如上表，略）

李达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在《关于包惠僧的代表问题复中国革命博物馆信》中说：“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包惠僧当时是武汉小组的党员，武汉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也到了上海，也住在大会代表的寓所。七月一日晚上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因为当时并不知道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但代表们并不承认他是代表。事后，包惠僧自称是广州党组织的代表，这不是事实。广州代表只有陈公博一人（当时广州只有三个党员：陈公博、谭平山、陈达材）。”

刘仁静一九五七年三月回忆说：“一大代表是十二人，李达的回忆较正确，包惠僧不是代表，他在开会前后经常出入诸代表房间，也到过会场，可能是列席或旁听。”（刘回忆的代表名单同上表，略）

三、陈潭秋同志等四人回忆代表为十二人，其中有包惠僧。

陈潭秋同志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在《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中说：“湖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我和董必武；山东济南的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北京的代表是刘仁静，……广东的代表为包怀琛（编者：即包惠僧）……。还有北平的张国焘，代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广东第二个代表为陈公博……。”

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中说：“上海利用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选举我出席，……我是住在大东旅馆，各代表也有住博文女校的，也有住别处的。周佛海、李鹤鸣（编者：即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包惠僧，都在那时认识，而毛泽东则因为在北大图书馆办过事，可以算是比较熟悉。”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说：“广州代表是陈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耆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生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

四、包惠僧回忆代表为十三人，其中包括他自己。

包惠僧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回忆说：“约在六月中旬，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李汉俊、张国焘等来信，临时中央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第三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也派代表来参加，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出席。陈独秀因职务关系走不开，当决定我同陈公博为广州区代表。”“在开会时统计出席的代表有七个地区，共十三个代表，计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陈潭秋。北京张国焘、刘仁静。山东王尽美、邓恩铭。上海李达、李汉俊。广州包惠僧、陈公博。东京周佛海。还有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李克诺斯基。”

上述九人的回忆材料，说包惠僧曾参加中共“一大”会议，几乎是一致的。只有毛泽东同志在“九大”讲话时没有提到包，而据《西行漫记》的记载，毛主席当时回忆的代表中是有包惠僧的。

关于包惠僧是否正式代表的问题，则有不同意见。九人中，李达、刘仁静坚持说包不是代表。董必武同志三次回忆中，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五六年的回忆说包是代表，一九七一年的回忆说包是以新闻记者身份参加了会议。其余六人（包括毛主席早期的一次回忆）则说包是代表。

至于代表的人数是十二人还是十三人的问题，则取决于包是否具有代表资格，包如不是代表，则为十二人；如是，则为十三人。根据上述材料分析，按照当时情况，包以非代表身份参加会议的说法，似觉牵强。代表为十三人的说法则比较接近事实。

罗章龙教授谈五四运动

编者按：自一九七八年八月开始，中国革命博物馆连续访问了罗章龙教授。现将他谈的有关五四运动的情况综合整理后刊登于下。整理稿经本人阅过。

罗章龙教授谈的其他问题，将陆续在本刊刊登。

六十年前，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象春雷一样，震撼着中国大地，揭开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五四运动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当时的中国虽然经过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但是

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民族危机深重，人民灾难无穷，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是必然要爆发的。

五四期间，北京大学的校长是蔡元培先生。一九一七年初，蔡先生到北大以后，聘请了不少社会知名人士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先生来校当教授。蔡先生主张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思想自由，使各个方面的人物都云集北大；同时经过几次考试，招收了大批优秀学生。这样，北大不仅在文化方面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而且很快就变成了学术思想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中心。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给中国革命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以李大钊同志为代表的一部分先进分子，积极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迅速转变为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

当时，我在北大文学院本科读书，是系学生会的成员。那时，北大学生会中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思想激进、意志坚定，是学生会的中坚。他们联合了学校中的进步力量，紧紧地团结在李大钊同志的周围，在大钊同志的影响和指导下开展工作，使北大成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北大学生会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主力，对五四运动起着推动作用。在运动爆发以前，学生会曾积极组织同学们讨论山东问题；当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完全失败的消息传来以后，立即形成了以北大学生会的中坚分子为主、并有国立八校的个别同学参加的一个行动组织。

这个行动小组有二、三十人，而到会商量事情的人并不多。我记得五四前夕，行动小组曾在宣武门外比较偏僻的北京国立高师开了个会，会上提出的简单口号是“打倒卖国贼”。大家一致认为，鉴于以往的教训，一般地搞搞游行请愿，要政府罢免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必须采取激烈的手段，用痛打卖国贼的办法刺激他们，迫使政府罢免这些卖国贼。于是大家出主意，议决了以下几个项目：第一，明天游行示威我们要到天安门主席台上，掌握大会的方向；要派一个同学去掌握住喇叭筒；要派人到队伍前列去打旗；还要组织口号队。第二，决定天安门大会开完以后，游行到东城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去示威。为此，我们曾派人调查去曹宅的路线和门牌号数。另外，为了打准卖国贼，不误伤他人，我们还派人到大栅栏照相馆去看陈列在橱窗里的那几个卖国贼的照片。第三，为了防备坏人的捣乱，成立了维持秩序的队伍；同时还规定了几条纪律，如进入屋子里不准侵犯妇女，不准拿东西等等。在这次会上，各校代表对第二天的活动作了周密的分工，保证了各项行动按照原定的计划，有组织地顺利进行。

五月四日那天，北京各校约三千多人在天安门集会。当时，北大的游行队伍在天安门主席台下面，其他学校在广场上。学生中有的穿着长袍，有的穿着黑短制服，手持写着“惩办卖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等标语的白布旗帜。游行时，打旗的走在第一排，各校代表在前面领队，维持秩序，北大负责指挥的是辅社成员易克嶷和其他同学。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得到北京市民的深切同情。当队伍准备向东交民巷西口使馆区前进时，遭到了帝国主义者雇佣的巡捕和中国军警的阻挠。这时，学生们亲眼看到在自己的城市、自己的街道，中国人不能通行，心情无比激愤，不得已把队伍退回原路，经东单直奔赵家楼。一路上，“打倒卖国贼”、“惩办卖国贼”的呼声响彻云霄。

赵家楼在一条东西向的胡同，一进去，里面有很多持枪的军警，他们一看队伍汹涌而来，就把铁门关了。于是，我们几个人用人梯的方式后一人搭着前一人肩膀，把曹宅临街的窗户打开，有四、五个人从窗口跳了进去，这几个人里有我、有匡日休。院子里面有一排军

警，他们没开枪。我们跳进去的同学首先把铁门打开了，外面的学生们象潮水一样冲了进去。当时曹汝霖不在家，章宗祥在曹家，大家把章宗祥捉到后，痛打了一顿。有一个日本人在章的前面挡着，掩护着他，连声说这是不能打的，不能把他打死的。因为我们事先就没有想打死他，这下已经打得不轻了，所以也就算了。此时，曹的老婆从里面出来，显得非常害怕，我们也没有打她。痛打卖国贼的目的达到了，我们的气出了，感到非常痛快。这时有一个同学把屋里的纸拢在一起放火烧赵家楼。点火的就是北京国立高师的学生匡日休。

匡日休，又名互生、务逊，是辅社成员，湖南宝庆（今邵阳）人，互生的意思即主张互助，匡是五四运动行动小组的中坚分子，他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以后因患癌症病故。他曾写文章，说五月四日点火烧赵家楼的是他，确实这火是他点的。当时还流传一种说法，说放火的是北大学生吴坚，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也是行动小组的成员，而且以后公审的时候也有他。

火着起来以后，大队伍立即撤退。军警就开始逮人，当天被捕的有三十二人。为了扩大爱国宣传，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各校举行总罢课，还建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作为统一的领导组织。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军阀政府被迫于五月七日释放被捕学生。以后学生的爱国宣传不断发展，到六月三日，各校学生举行规模空前的讲演活动，又遭到军警的大肆拘捕。消息传出以后，上海的工人阶级首先加入了战斗行列，展开了规模浩大的罢工斗争，很快波及到全国。最后，反动当局不得不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批准曹、陆、章三人辞职。

但是京师警察厅和步军统领衙门（清朝时叫九门提督，清朝垮台以后叫步军统领）不甘心，要搞清楚究竟谁是烧赵家楼的主谋，一定要破这个案子。关于火烧赵家楼的事，我们从一开始就绝对保密。但是这件事牵涉的面很大，时间一长，事情就慢慢地漏了出去。军警经过五、六两个月的调查，了解到一些情况，七月初传票就下来了，大约传了十五人左右。政府强加给学生的“罪名”是“反对政府、扰乱治安、殴打官吏”，准备开庭公审。我们的对策首先是抓住社会舆论，争取广大群众的同情、支持。我们尖锐地提出，学生闹事，究竟是叛国罪还是爱国罪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来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绪。法律系的老师自告奋勇地给我们当义务律师，为我们作辩护。当时流行一种说法：赵家楼的火是曹汝霖自己放的。我们为了绝对保守行动小组放火的机密，捂住事实真相，所以不反对这种说法，并利用它作自己的文章。律师也为我们辩解，说这火是曹汝霖自己放的，其目的是想加罪于学生，实际上与学生无关。法官不同意这种说法，反驳说，难道章宗祥是自己打自己吗？律师又起来辩护说，这火也可能是群众放的，但不是今天传讯的学生放的。其次，我们还有计划地组织同学到法院旁听，包围公堂。当时法庭旁听席可坐三、四十人，我们一去就把它全部占了，同时，在法庭周围还站满了同学。这样一来，司法机关就很被动、很孤立，左右为难，而我们却占了上风，法官迫于形式，只好宣判这些学生无罪。

那年六月还发生一件事，就是陈独秀（时为文学院院长）被捕。他的被捕也不是偶然的。陈独秀是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新青年》与《每周评论》的主编。反动当局对这些刊物是十分仇视的。但是，这两个刊物文风不一样，前者是季刊，长篇大论，军人不爱看，因此没有引起他们足够重视；而后者文章短小精悍，文笔锋利，战斗性强，政府把它视作眼中钉，不久，《每周评论》就由最初的半公开状态变成后来的秘密发行。五四期间，外边就传说政府要查封这个刊物。另外，还传说皖、段、直、奉几个军阀头子在北京聚会，谈到五四

运动时，一个军阀头子很气愤地向警察总监说：“太不成话了，你们还不把这些‘共产公妻，大逆不道’的人抓起来！”当时在座的有教育部的负责人，会后就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北大，要陈独秀避开一些。恰好在这时，我们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策动反抗政府的高压政策，用北京市民的名义印发了《北京市民宣言》，内容主张推翻段祺瑞政府，要求言论结社自由。传单印好以后，我们就到各处去散发。当时，陈独秀、李大钊等先生亲自参加学生的爱国宣传活动是常有的。而这次是陈独秀单独行动，大家都不知道，他带了一卷传单，跑到新世界商场，站在劝业楼的最高层往下散发，他动作缓慢，被暗探发觉后跟踪到天坛被抓走了。

捉到陈独秀，对警界来讲是立了个大功。然而北洋军阀政府内部对此事有两派意见：军人主张严厉镇压，而文官则主张从宽处理。陈被捕后看守很严，与外界隔绝。我们为此大造舆论，指责政府捕陈是对爱国运动的破坏，动员法团等组织营救他，还把陈被捕的消息传到上海等地，迫使政府在三个月以后没经审问就释放了陈。以后，传说政府还要捕陈，于是我们商定让他出走。从此，陈独秀便离开了北大，离开了北京。

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出现了许多研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团体。一九二〇年三月在北京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研究会在大钊同志的领导下，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做了大量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同时，这个组织的成员还到工人中去，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促进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直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把广大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天津“觉悟社”社员代号及化名

天津“觉悟社”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成立时，有社员二十名（男女各十名）。社员们相约，通信。字成文章不用原来姓名，而用抓阄的方法决定每个人的代号（共准备了五十个号码）；用自己号码的谐音取一个化名。如周恩来同志抓到号数为5号，化名“伍豪”；邓颖超同志抓到的号数为1号，化名“逸豪”。

为同志们阅读、研究这方面历史资料提供方便起见，现将所辑录的经当事人印证、核实的社员代号及化名刊出，并望熟悉、了解这段历史情况的同志补充、指正。

号码	姓名	化名
1	邓颖超（女）	壹、逸豪
3	周之廉（女）	珊
5	周恩来	伍豪
9	赵光宸	佗因（系英文九Nine译音）
11	薛撼岳	石逸、石遣

13	郭隆真(女)	石衫、石珊
18	管易文	石霸(又关锡斌)
19	潘述庵	石久(潘世纶)
20	胡维宪	念豪
21	吴瑞燕(女)	?
25	刘清扬(女)	念吾
28	李震瀛	二八(李宝森、又振因、大汉、泊之)
29	马 骏	念久
31	李锡锦(女)	衫逸
34	郑季清(女)	衫峙(即郑岩、又寿禄六漱、)
36	张若名(女)	衫陆(即张砚庄)
37	张嗣婧(女)	衫弃
41	谌小岑	施以(又略称小小以)
43	李毅韬(女)	施珊、峙山(施山、又略称山、珊)
50	谌志笃	武陵

以上共二十名。另外，后加入的张淑文(女)，无代号和化名。还有“觉悟社”有社友陶尚钊、黄爱(正品)、杨乃贤、韩循华、王卓吾等多人。据一九二三年第一期和第三期《觉悟》有关文章中，有觉悟社“二十几个社员星散中国南北各地及欧美洲”和二十几个同志们，大家携手作先驱”的记载，所指数字“二十几个”，可能包括社员和社友在内。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会 举办陈独秀等历史人物评价的讨论会

本刊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会，于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举办了陈独秀等历史人物评价讨论会。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会去年十月十三日成立的。当日，北京地区的党史、革命史教学和科研人员三十余人，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举行座谈会，会上，一致通过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会，推举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负责日常工作，并决定于一九七九年初召开一次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讨论会。这次讨论会便是根据这个研究会成立的决定在北京开展的第一次活动。参加这次讨论会的主要是北京地区的党史、革命史教学与研究单位的同志，也有外省市的少数同志赶来参加，共约六百余人。

会上，着重讨论了陈独秀的历史评价问题。大家在发言中，一致认为，陈独秀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一个很有影响的重要人物。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将之一，是五四爱

国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曾任五届党的总书记，是党成立后直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他对开创革命作过重大贡献，也给革命事业带来过巨大损失，最后反堕落为无产阶级的叛徒。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进行认真研究，实事求是地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出全面的评价，是研究党史、革命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形而上学的横行，这样的问题却是党史研究的“禁区”。特别是林彪、“四人帮”一伙，打着“宣传毛主席”的幌子，肆意篡改党的历史，说“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毛主席的建党路线战胜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伟大成果”，为此，就把陈独秀说成从来就是个坏蛋。谁要反对他们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讲点真实的历史，就要遭到各种横祸，说你为叛徒树碑立传，是叛徒的孝子贤孙，受批评，被揪斗，开除党籍以至非法关押。大家认为，林彪、“四人帮”已被粉碎，他们在党史、革命史研究中设置的禁区、制造的枷锁，应统统彻底冲破和打掉，对于陈独秀评价问题当然也不例外，是历史地全面地评价陈独秀这个历史人物的时候了。

大家在讨论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时，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尤其是在如何看待他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历史上，分歧比较大。分歧的焦点主要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有没有转变？转变的程度如何？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一种意见认为，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是一个典型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十月革命炮声的鼓舞下，五四运动的洪流推动他开始转变。由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受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影响，使他突破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旧壳，成为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九二〇年四、五月份在建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以后，他又走出研究室，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相结合，在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虽然这时他的主要言行仍带有幼稚性和某些旧痕迹，但他的基本政治立场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的，他的基本政治主张是正确的，他观察社会问题的方法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仅仅是迈了第一步），这表明他已经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展成为我国初期马克思主义者了。当然，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另一种意见认为，陈独秀在这个时期的思想有转变，但只是由一个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于他的世界观仍是资产阶级的，他对改造中国社会的基本观点是靠有知识的“先知先觉”少数人，看不见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他在改革旧制度问题上仍然是在旧制度范围内打圈子，因此，他仍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陈独秀这个时期的思想虽然有所前进，但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他虽然宣传马克思主义，也仅是宣传而已，并没有实行，所以，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讨论会上，还对李大钊、瞿秋白和胡适的评价提出了一些看法。

在对李大钊的评价中，发言的同志批判了“四人帮”对李大钊的诬陷不实之词，用大量历史事实说明了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教育一代青年等方面的历史功绩，歌颂了他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英勇战斗和壮烈牺牲的英雄气概。有的同志认为，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也可以说他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奠基人。

对瞿秋白的评价问题，发言的同志主要就他的《多余的话》提出了一些看法。指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

的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多余的话》有消沉、灰暗的一面。但是，权衡他的全部历史功过，特别是他的从容就义，不能认为瞿秋白是“叛变革命”或“晚节不终”。

在讨论评价胡适时，有的同志认为，胡适在五四前，也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他是文学革命倡导者之一，主张白话文，这在当时是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的。

这次在讨论评价历史人物过程中，还涉及到如何端正研究和讲授党史、革命史的方法问题。有的同志认为，研究和讲授党史、革命史的方法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地收集和掌握材料，加以分析和综合，从中引出带规律性的东西。引用历史材料要确切，要按照历史本来面貌来讲历史，不管谁讲的，不真实的不算数。根据这些年的教训，研究党史、革命史不能从马克思主义个别词句出发，不能先搞一两句话录作为结论，然后去找个别材料来证明，而不顾大量的客观事实。这种方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应该坚决反对。

这次讨论会，是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在北京地区举办的第一次。与会的同志普遍认为，这次讨论会开得好，很受启发，希望今后继续开下去，把党史、革命史的科学研究空气进一步活跃起来。

（姜华宣、高军）

列宁论普列汉诺夫

编者按：怎样评价历史人物，这些年来被林彪和“四人帮”搞得一塌糊涂。他们把一些人加以神化，一些人加以鬼化，从来不尊重历史，从来不讲分析。

我们摘录一些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分析，是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怎样对待历史人物的。

普列汉诺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一八八三年创立了“劳动解放社”，后来同列宁一起创办了《火星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的批判，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后来他同列宁分裂，与孟什维克同流合污，在战争和革命等重大问题上，都反对列宁的路线。一九一七年，他反对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对这样一个人物应当怎样评价？看看列宁的论述，对我们会有很大启发。

一 当普列汉诺夫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列宁对他十分尊重，并高度评价他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的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的最时髦的“批判”作了

无情的批判，他做得完全正确，现在连德国工人的代表人物也摒弃了伯恩斯坦的观点（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

（《我们的纲领》1899年。《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二 当普列汉诺夫成为孟什维克以后，列宁尖锐地批判了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的那个得到一切机会主义者支持的观点，是再近视不过的了。他认为，本来就不应当展开不合时宜的罢工，“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指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此次革命遭到沙皇政府野蛮镇压，失败了。普列汉诺夫在事后指责革命，说了这句话。——摘编者）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勇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单靠和平罢工是不行的，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

（《莫斯科起义的教训》1906年。《列宁全集》第11卷第153页）

你们看一看普列汉诺夫在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上的言论吧！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和库斯柯娃夫人是多么高兴地欢迎普列汉诺夫的言论，而他们恰恰是在一九〇〇年因为企图用资产阶级观点来腐蚀社会民主党而被普列汉诺夫赶出党的。现在，普列汉诺夫接受了臭名昭彰的普罗柯波维奇和库斯柯娃的策略《Credo》（即信条、纲领、世界观。——原编者注），而伯恩斯坦分子竟厚颜无耻地给他送飞吻，叫嚷说：我们资产阶级民主派一向就是这样说的！

普列汉诺夫为了走进立宪民主党的前厅，只好在全体人民面前背弃自己昨天的声明。

（《论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1906年11月23日。

《列宁全集》第11卷第298页）

三 列宁在批判普列汉诺夫的路线错误时，对他在理论上的功绩一直肯定，予以保护，并且认为普列汉诺夫的一部名著曾经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著作（主要是批判民粹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仍然是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牢固成果，任何“派别活动”都不能混淆视听，不能使稍微有些“理智”的人忘记或者否定这些成果的重要性。但是作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袖，作为一个策略家，普列汉诺夫却经不起任何批判。他在这方面表现的机会主义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带来的危害性，要比伯恩斯坦的机会主义给德国工人带来的危害性大百倍。我们必须向普列汉诺夫这种立宪民主党式的政策展开最无情的斗争，因为他已经回到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从社会民主党中清除出去的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之流的怀抱里去了。

（《卡·考茨基一书的俄译本序言》

1906年12月。《列宁全集》第11卷第398页）

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修改”的真正的阶级意义是什么，这无须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不说自明的。我们仅仅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太讲特讲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所以必须坚决地着重指出，是因为现在有些人极其错误地企图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在策略方面的机会主义为幌子来偷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垃圾。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1908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3页）

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全都在驳斥唯物主义，同时又装出一付样子，好象他们驳斥的本来只是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而不是唯物主义者恩格斯，不是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不是约·狄慈根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且他们是根据“最新的”“现代的”实证论、自然科学等等来驳斥唯物主义的。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1908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16页）

在“前进”文集里，另一位“实践家”，彼得堡的“纺织工伊一恩”也是没有要成外交手腕而泄露了机密。他写道：“顺便指出，别尔托夫（即普列汉诺夫——摘编者）的‘一元论的观点’一书（即《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摘编者）特别能够引起这种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正确的概念”。（文集第57页）当然罗！只有俄国造神派和马赫主义者的著作才会提供“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正确的“概念”，哪一个“前进派分子”不知道这一点呢？可是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即指《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摘编者）怎么能够同尤什凯维奇、波格丹诺夫、瓦连廷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之流（皆马赫主义分子，“前进”文集的作者——摘编者）的哲学著作比高低呢……

（列宁为自己《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一文写的注

1910年8月30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267页）

四 列宁把普列汉诺夫在策略和组织上的错误分成几个阶段，进行具体分析

就拿他们中间最优秀的普列汉诺夫来说吧。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1883——1903年的20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

但是从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就在策略和组织的问题上极可笑地动摇着：（1）1903年8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2）1903年11月诺（“火星报”第52号），主张同“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建立和平；（3）1903年12月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热烈的孟什维克；（4）1905年春天，布尔什维克胜利以后，争取“敌对的兄弟们”的“统一”；（5）1905年年底到1906年年中是一个孟什维克；（6）从1906年年中开始，有时离开孟什维克，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斥责孟什维克（切列万宁已经承认）“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7）1908年同取消派决裂；（8）1914年又重新转为取消派。

（《论冒险主义》1914年6月9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359—360页）

五 列宁在普列汉诺夫逝世后，建议把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

当我们在1902—1903年制定我们党的第一个纲领时，我们总是想到爱尔福特纲领的例子。普列汉诺夫当时说得很对：“不是伯恩斯坦埋葬社会民主党，就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他”。说这句话的普列汉诺夫特别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点：爱尔福特纲领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上是胆怯地向机会主义者让步。所以从1903年起，我们的纲领就提到了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1年。《列宁选集》第4卷第338页）

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我觉得在这里应当附带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①）

①顺便说一下，不能不希望：第一，把现在正在出版的普列汉诺夫全集中的所有哲学论文汇编成一卷或几卷专集，并且附上详细的索引等等。因为，这种专集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第二，我认为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知道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并且善于把这种知识传授给学生。不过这一切已经是离开“宣传”而转到“行政手段”上面去了。（列宁原注）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

1921年1月25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第一次提出：刘少奇“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以后在一九六九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九七一年两报一刊纪念党的五十周年的社论中，都把“和平民主新阶段”作为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予以批判。直到去年，有的文章还是这样。

为便于研究这个问题，现将抗日战争胜利后有关这个“新阶段”提法的一些资料摘编如下，供参考。